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夏丏尊散文选集



沈祖堯
黎錦暉
周作人
朱自清
林語堂
胡適
朱東安
徐志摩
葉聖陶
冰心
朱自清
朱東安
黎錦暉
周作人
沈祖堯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林呐 徐柏容 郑法清

夏丏尊散文选集

欧阳文彬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夏丐尊散文选集

欧阳文彬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6 5/8 插页2 字数129,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7-5306-0842-8/I·755

定价：4.5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欧阳文彬 (1)
读书与冥想	(21)
春晖的使命	(26)
传染语感于学生	(29)
教学小品文	(33)
《爱的教育》译者序言	(42)
“无奈”	(45)
《子恺漫画》序	(47)
怯弱者	(51)
闻歌有感	(62)
长闲	(68)
猫	(75)
关于国木田独步	(83)
小说的开端	(88)
对了米莱的《晚钟》	(91)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99)
关于《倪焕之》	(102)
《中学生》发刊辞	(106)

《续爱的教育》译者序	(107)
《鸟与文学》序	(108)
我的中学生时代	(110)
新年的梦想	(117)
命相家	(118)
光复杂忆	(123)
我之子书	(125)
白马湖之冬	(127)
灶君与财神	(129)
紧张气氛的回忆	(133)
春的欢悦与感伤	(136)
一种默契	(138)
良乡栗子	(140)
中年人的寂寞	(143)
两个家	(146)
送殡的归途	(150)
钢铁假山	(152)
试炼	(155)
阮玲玉的死	(157)
读诗偶感	(160)
坪内逍遙	(163)
早老者的忏悔	(167)
整理好了的箱子	(170)
《十年》序	(175)
我的良友弘一和尚	(177)
日本的獐子	(180)

鲁迅翁杂忆	(183)
弘一法师之出家	(187)
与丰子恺论画信	(193)
读《清明前后》	(195)
寄意	(202)

序 言

欧阳文彬

夏丏尊（1886-1946），名铸，字勉旃，后改字丏尊。浙江上虞松厦人。祖上经商，祖父事业失败后家道中落。自幼从塾师读经书。1901年考中秀才后科举即向学校过渡。1902年离家上学，先后进上海中西学院（东吴大学前身）、绍兴府学堂（浙江第五中学堂前身），都因家贫只读了一个学期。1905年向亲友借贷赴日留学，先后进东京宏文学院、高等工业学校，也因经济困难未能读到毕业。1907年辍学归国。一张文凭也没有拿到。他的知识才学全靠自学得来。

1908年应聘为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通译助教，后兼任舍监和国文教员。1920年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被迫离职，去湖南一师任教。1921年到家乡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并在湖畔造平房定居，题室名为“平屋”。1925年因与校长意见不合而辞职，去上海立达学园任教。1926年一度回白马湖家中写作，兼编立达学会会刊《一般》，同时兼做开明书店编辑工作。1927年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开明改组为公司时出

任编辑所长。1930年创办《中学生》杂志。1936年被推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明书店毁于炮火。开明同人陆续内迁时因年老多病留守上海。上海沦陷期间坚贞自守，矢志不为日方做事。1943年被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获释，健康更形恶化。抗战胜利后病情加剧。1946年12月23日逝世。

夏丏尊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数量不多而影响深远，在他生前收集成书的有《平屋杂文》。他又是“五四”时期最早介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译过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芥川龙之介等的小说，还从日译本转译了不少西欧文学作品，影响最大的是《爱的教育》（亚米契斯著）。他从事国文教育多年，并毕生关心国文教育，这方面的论著有与叶圣陶合写的《文心》和《文章讲话》，与刘薰宇合编的《文章作法》等。他主持的开明书店刊行了许多优秀的新文学书籍，其中不乏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佳作，有些还是作者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如丁玲的《在黑暗中》，巴金的《灭亡》、《新生》、《家》，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子夜》，叶圣陶的《城中》、《倪焕之》，等等，对于新文学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柯灵说：“他是教育家、文学家和出版家，三者浑然一体，互相映发，互相渗透，共同的基础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①

① 柯灵：《“欲造平淡滩”——夏丏尊先生生辰百年祭》，《上海文史资料——纪念夏丏尊专辑》，1986年9月。

—

夏丏尊的前半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的变革，新思潮一浪接着一浪，思想界空前活跃。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和青年朋友们一起，对中国怀着相当的期望。《我的中学生时代》中有一段回忆他在绍兴府学堂时的情况：

“庚子事件经过不久，又当日俄战争，风云恶劣、大家把一切罪恶归诸清人，以为只要把满人推倒，国事就有希望了。《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大受青年界的欢迎、报纸上的社论也大被注意阅读。……三朋四友聚谈，动辄就把话题转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谓革命，内容就只是排满，并没有现在的复杂。见了留学生从日本回来没有辫子，恨不得也去留学，可以把辫子剪去（当时普通人是不许剪辫子的）。见了花翎颜色顶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恶，以为这是奴隶的装束。”

那时夏丏尊才18岁，正是认识社会、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时刻。青年人血气方刚，热衷革命，对革命的理解却很单纯，认为只是推倒清王朝。就连赴日留学的风气，也并非为了“镀金”，而是出于思想上的追求，就连剪辫子也是因素之一。难怪后来夏丏尊对辛亥革命抱有很大的期望。《光复杂忆》就记叙了他在光复初年的兴奋心情，谈到“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不料辛亥革命后紧接着出现了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局面，使夏丏尊的希望归于幻灭。他目睹政界的黑暗，发誓决不从政做官。并为此改名丐尊，因为当时有实行普选的说法，他

不愿当选，改用这个容易写错的名字，如果选票上将“丐”字误写为“丐”，就要作废。虽然如此，他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关心并未稍减，一心想当一个无愧于时代的好教师。这就是他在一师任教时的精神状态。

他认为教育是一种英雄的事业。他也确是带着英雄气概投身教育工作的。看到舍监在校中地位低下、被人轻视，就自告奋勇兼挑这副担子；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兼教国文，不辞劳苦，身兼三职，而且事事认真，全力以赴。事后自嘲当时“俨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①

正是这种精神，使夏丏尊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家，在兼任舍监与学生晨夕相处的岁月中，孕育了以情爱为生命的教育理想；在兼教国文的辛勤探索过程中，萌发了革新国文教育的宏愿。

当时先后在一师任教的有周树人（鲁迅）、许寿裳、刘大白、李叔同（弘一）、李次九、陈望道等。师资力量雄厚，学生思想活跃。1913年成立校友会（学生自治会前身），并在夏丏尊指导下创办《校友会志》，成为学生学习写作的园地。夏丏尊带头写稿。他的早期诗文多发表在这校刊上。“五四”运动中，一师和北大遥相呼应，成为浙江学运的中心。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夏丏尊、陈望道、李次九被称为一师的“四大金刚”。夏丏尊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把某些企图用老规矩来抗拒新思潮的举动斥之为“螳臂挡车”，对某些认为“五四”后旧法已破、新风未立，学风较前嚣张，因而感到忧虑的好心人则耐心地说理，指出：

① 《紧张气氛的回忆》。

1919年的教育界，最可记念的就是一个“动”字！“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美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美无缺’接近的方法，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①这样观点鲜明的文章，对勇于革新的进步学生自然是有力的支持。当时就读于浙江甲级工业学校的沈端先（夏衍）曾与一师学生合办《浙江新潮》周刊，他至没有忘记夏丐尊怎样鼓励他们像北大学生一样去闯破沉闷的空气，还说夏丐尊支持一师学生施存统（施复亮）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的行动，成了青年人“精神上的支柱”^②。

在反动当局和顽固派眼中，早已把“四大金刚”视为一师学生“嚣张”的罪魁祸首，于是以《非孝》事件为借口，责成校长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遭到经校长的拒绝，又下令撤换校长，终于激发了有名的“浙一师风潮”，得到杭州各校和京沪等地学生的响应，迫使浙江当局收回成命。过后不久，经亨颐和“四大金刚”虽仍不得不离开一师，这场风潮的意义却不容低估。

这段时间，夏丐尊写的主要剖析中国宗法社会、提倡社会改造和妇女解放，以及革新教育的论文、杂感和旧体诗词。他的兴趣还没有专注在文学上。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段生活对他日后创作的影响。

夏丐尊和鲁迅在一师共事时过从甚密，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鲁迅的影响。1909年就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

①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第5号，1919年12月31日。

② 夏衍：《忆夏丐尊先生》，《上虞文史资料——纪念夏丐尊专辑》，1986年9月。

动的反对神力复古的“未瓜之役”。后来又在鲁迅启发下提高对文学的兴趣。当时鲁迅还没有写小说，也没有用鲁迅的笔名，但已立志通过文学改造国民精神，并开始从事文学翻译。他见夏丏尊小说读得不多，曾以《域外小说集》相赠，使夏“眼界为之一广”，从此不断扩大阅读视野，还从日译本转译西欧作，所以自称是“受他（鲁迅）启蒙的一个人”^②。

夏丏尊对艺术的兴趣可能还多少受到李叔同（弘一）的影响。李叔同多才多艺，于文学、戏剧、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无一不精。1912年他到一师教图画、音乐，使这两门一向不受重视的功课吸引了全校学生。夏丏尊认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甚至说：“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③但也承认：“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给我以启示”^④。他俩共事七年，情逾手足，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互赠印章。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丰富的教学实践和人生经验，还有鲁迅、李叔同等良师益友的熏陶，对夏丏尊来说都是宝贵的积累，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准备了条件。他被迫离开一师后并没有为自己的遭遇抱屈，心里想的还是大局。《误用的并存与折中》^⑤一文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

①② 《鲁迅翁杂忆》。

③ 《弘一法师之出家》。

④ 《我的良友弘一和尚》。

⑤ 《误用的并存与折中》，《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号，1922年3月。

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之外，有什么大分别？”可是他把这种现象的病根归于祖先传下来的“中庸之道”，认为医治这种宿疾的药方是“极端”。他希望军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来改变中国的面目。他本人自然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自认为“怯弱者”。

他还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这“痴呆的人”是指释迦、耶稣等类的人。他在文中写道：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可已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

他呼唤“痴呆的人”是为了反对庸俗调和派和一切伪善者。还说：“没有释迦、耶稣等类的大痴呆也可以，至少，像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

看来夏丏尊是想做个“小痴呆”的。在春晖和他共事的朱自清说：“夏先生是以宗教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还说他翻译《爱的教育》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与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①朱自清说的宗教精神，其实就是夏丏尊说的“痴呆”精神。

这自然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但夏丏尊是非分明而富于正义感，对一切忠于理想的革命者是衷心敬佩的。当年和他在湖南一师共事的毛泽东（当时名毛润之）北伐时曾对朋友们说夏丏尊不了解政治，但对他的人格很崇敬，^②并

^① 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写于1946年。

^② 傅杉然：《记夏丏尊先生》，写于1946年。

非无因。另一方面，他有意致力于创作的倾向也已在文中有所流露出来。当他来到白马湖畔，创作的冲动也就油然而生。

二

夏丏尊的散文创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春晖时期（1921—1925）和开明时期（1926—1937）。抗战期间，他蛰居孤岛，基本搁笔。抗战胜利后又因贫病交迫，匆匆辞世。

春晖和开明这两个时期，是他从事教育和出版事业的鼎盛期，但其间仍有艰难曲折，对他的思想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

夏丏尊曾把自己的教育理想寄托在春晖中学，一心想在白马湖畔创造出理想的学习环境。这一时期写的散文都取材于教学生活。数量虽少，却是一篇有一篇的分量，记录了他奔向理想的脚印。

《春晖的使命》用了第二人称写法，从亲切的呼唤开始：

啊！春晖啊！今日又是你的诞辰了！你堕地不过一年零几个月，若照人的成长比拟起来，正是才能匍匐学步的时期，你现在正跨着你的第一步，此后行万里路、都由这一步起始。你第一步的走相，只要不是厌恶你的人们，都说还不错。但是第一步终究是第一步，怯弱的难免，即在爱你的人，也是不能讳言的。

作者以园丁的眼光来看刚开始迈步的春晖，对它跨出的第一步，既满怀喜悦，又寄有厚望。尽管社会上口碑不

错，夏丐尊自有更远大的期望。这期望就寓于文中宣告的“使命”之中。从第一步着手的农民夜校，瞻望往后，“至少先使闻得你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在二十年代初，教育尚未普及的中国，一所资金并不充裕的乡间私立中学，敢以农村扫盲为己任，足以见出夏丐尊对乡村教育的雄心壮志。事实上，他之所以应聘来春晖任教，看中的正是它的“私立”，因为私立学校“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他立志要在官立学校穷得关门和风潮叠起声中让春晖“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他邀来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如朱自清、丰子恺、刘熏宇，形成“同志的集合”，把这看作办好学校的“最要紧的条件”，希望靠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以精神的能力，打破物质上的困境。”并且“冒了社会的忌讳”，在全省中等学校中第一个实行男女合校。这些设想和措施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篇文章是最近发现的佚文，可说是理解夏丐尊教育思想的一把钥匙。

在春晖任教期间，夏丐尊还用一年多的课余时间，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他在本书的译者序言中说，他曾经流了泪读完此书，又含着泪译出此书，因为：

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得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

这本书使他受到异乎寻常的感动，是由于书中展示了理想世界的情景，明知只是幻影，仍然激起他执著追求的

渴望。与此同时，他情不自禁地把现实状况和书中的描写对照，一方面反省自己“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一方面剖析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弊病，在译者序言中写下了一段语重心长的文字：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育顾及。

接着用了有名的比喻：

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译者序言中的前一段文字介绍书中的理想世界情味，吸引了无数读者，包括父母、教师和儿童，凡是读了这篇序言的人无不急于一读全书，去体会那诱人的情味。后一段谈论教育要素的文字，获得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鸣。教育上的水是情爱，几乎成了教育界家喻户晓的比喻。《爱的教育》原著在国外的名声不如卢梭的《爱弥尔》，在中国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爱弥尔》。这其中，夏丏尊的译者序言功不可没。时至今日，这篇序言仍可作为独立的散文名篇流传于世。

一篇谈学校使命的文章，本可以写成章程式的条文；一篇译者序言，一般不过是对原作者和原著内容的简介，在夏丏尊笔下，却都成了具有独立价值、能够发人深省的